

关东军招募、训练伪蒙军骨干

郭文林

(1954年5月22日)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我以翻译的名义，随着凌升（此人是活动家）于1931年10月20日由海拉尔起程，23日到达奉天。我到奉天后，带着森赳少佐的介绍信去见日寇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上尉，我与他取得联络后，他很表示欢迎。对他说明来的意思，他同意与凌升见面谈话，我得到许可后，回到旅馆（日本站万国旅社）。第二天上午同凌升到关东军司令部见片仓参谋，由他的介绍会见了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。凌升对他说明了来意，“目的是协助蒙古民族取得自治权”和征求对蒙古问题的意见。板垣征四郎说：“现在不能明确的答复，但是很愿意协助你们的活动。”谈话完后我二人辞别，到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处，同他会见后凌升说明来意，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很表示同意。我同凌升达到目的，于同年11月19日由奉天起程回到海拉尔。同年11月29日又由海拉尔起程，12月3日到奉天，这时候蒙古王公都聚在奉天活动（我所知道的有温亲王阳森扎布、图谢图五业王爷、诺勒尔格尔公、巴公爷等人）。这时候我担任翻译联络的事务。当然，阳森扎布为解决该旗的经济困难（这时该旗因为蒙古自治军的到处吃喝而受到严重的损害），由关东军和奉天市公署借用十万元（当时奉天市市长是土肥原贤二）。关东军通知凌升借给阳森扎布，但是当时阳森扎布已回旗不在奉天，凌升派我到郑家屯去报信联络。我接

到凌升的命令后，冒着危险到郑家屯送信，忠心耿耿完成任务，回到奉天受到凌升的夸奖。

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后，为巩固其占领地位，很迅速地在中国的东北各地建立忠心为日寇服务的军队，来镇压人民的反抗。因此，于1931年12月10日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上尉指示我急速回海拉尔，招集有初中程度的蒙古青年20名，在奉天日寇铁道守备队第二大队训练6个月，作为将来在海拉尔编制军队的骨干。我接受指示后，得到凌升的同意，于12月10日由奉天起程，13日到达海拉尔后，得到当地贵都统和当地驻军苏炳文的许可，开始宣传召集工作，很顺利的完成任务，召集了满登泰（战死）、胡复光（战死）、富格吉苏（伪满军中校）、莫得尔图（陆军兴安学校军士候补者队队长，上校）、郭通尚（1936年被判刑15年，押在齐齐哈尔陆军监狱病死）、郭文通（铁石部队的骑兵团团长，少将）、拉玛松（伪满陆军中尉）、额仁泰（伪满海拉尔警察学校教官）、倭兴台（1936年被判刑14年，在齐齐哈尔陆军监狱内病死）、委兴泰（伪满军少校）、喜拉布（中校）、阿钦嘎、双和尔等13名。同月21日我带领他们由海拉尔起程，24日到奉天，当日下午送入了奉天日寇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二中队受训练（第二大队长岛本中佐，第二中队长小野大尉）。他们入队后，片仓大尉指示我住在奉天监督、鼓励他们的学习。1932年3月间，贵都统、凌升到日寇守备队视察他们接受训练的情况，看了他们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。1932年5月10日训练完了后，我到奉天接他们回来。我到奉天后，到日寇第二大队，当时由日寇守备第二大队长岛本中佐带领到关东军司令部致谢。我代表致谢词，后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大将夸奖他们学习得好，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努力。而后一同在日寇司令部的楼上照相，参加者有本庄、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少将、板

垣征四郎、片仓衷、岛本。当日晚间由板垣征四郎在志诚饭店设宴欢送，祝贺他们的前途光明。当日晚车送他们回海拉尔。

编者注 郭文林，原名色尔鲁格，达斡尔族，1906年生。1929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1931年回国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，从事所谓蒙古独立的叛乱活动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期间，受关东军板垣高级参谋等人的唆使，随同熙洽、凌升等人参与拼凑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活动。伪满时期，先后任伪军上校侍卫官、上校禁卫军团长、上校侍从武官、兴安军管区上校参谋长、伪第二师少将师长、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官、兴安陆军学校校长、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。

（摘自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》的《九·一八事变》卷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。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）